

# 共产国际和毛泽东的独立自主思想

朱文显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三者是互相联系，互相渗透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国际性的事业，因而需要各国无产阶级互相支援。但是完成这个事业，首先需要各国无产阶级立足于本国，依靠本国革命力量和人民群众的努力，使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把本国的革命事业做好。因此，可以这样认为：独立自主又是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前提和归宿，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最重要的保证。

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sup>①</sup>。这不但是对于中国革命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对于独立自主原则最精辟的表述。独立自主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共产国际的错误进行的长期斗争中产生、发展和完善起来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宝贵的理论和精神财富。在当前国际风云变幻，我国又处在社会主义建设重要发展阶段的情况下，研究这一问题，对于提高我们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开创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新局面的信心，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从根本上来讲是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又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经过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的帮助建立起来的。因此，从党的成立开始，就接受了共产国际的组织原则，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下属单位。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就明确规定：“党中央委员会应每月向第三国际报告工作”<sup>②</sup>。在党的二大上，又作出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的决议案》，“决议正式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而这二十一个条件中的第十七条明确规定：“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执行。”这是因为“共产国际是在非常激烈的国内战争的情况下进行活动的，因此，它应当比第二国际组织得更加集中。”<sup>③</sup>这就告诉我们，共产国际是一个高度集中的世界共产党组织，它与加入的各国无产阶级政党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中共既然成为它的一个支部，一方面要接受共产国际的具体指导(这种指导在党的幼年时期还是必要的)；而另一方面，又必然要受到共产国际组织纪律的约束，从而对自己独立自主地开展活动带来障碍。

在整个大革命时期，中共的路线、政策和策略，都是由共产国际一手决定的。共产国际不仅对

于中国革命的大政方针作决议,下文件,而且派遣代表坐镇指挥,形成事无巨细,唯共产国际的命令是从的不正常状况。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压制中共党内的正确意见,使中共根据实际情况独立自主地处理革命过程中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成为不可能。对于1926年上半年所发生的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右派所进行的一系列反共和限共活动的处理,就是生动的例证。

1926年1月,召开了国民党二大。这是孙中山逝世之后召开的第一次国民党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多数。面对当时国民党右派的猖狂反共活动,广东中共组织的负责人周恩来、陈延年等在会前商定:应该采取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政策。计划公开开除老右派戴季陶、孙科等的党籍;在选举中委时,力争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并且给新右派蒋介石以回击,把共产党员从蒋的部下撤出,另外与当时的国民党左派头目汪精卫一起成立国共两党合作的军队。根据当时的情况,实现或部分实现这个计划是有可能的。但是,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却到上海与孙科等国民党老右派谈判,答应中共不包办国民党的党务,由中共建议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二大延开,等候他们参加。最后,硬是把这一批老右派请回了广州参加会议。这是一个后果极为严重的步骤,蔡和森指出:“到底什么时候起党的中央领导机关——中央出现了机会主义呢?在三月二十日稍前一点,即在国民党第二次大会上。更确切地说,是在现在前任中央和当时的前任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主张和国民党右派合作,并同其首领孙科会谈,邀请他回广州的时候。这是向资产阶级让步的开始。”<sup>⑤</sup>这一次让步的结果,使得大会选出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内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处于次要地位,中央监察委员会内右派占了绝对优势。更为严重的是通过这次大会,大大抬高了蒋介石在党内和军内的地位,为其进一步发展势力和篡党夺权造成了有利条件。

另一件事是对“三二〇事件”的处理。事件发生后,周恩来、陈延年、聂荣臻和正在广州的毛泽东都主张对蒋介石进行反击。周恩来还曾对当时的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国民革命军六个军中,只有第一军是属蒋指挥的,其余五个军都不会听他的。而第一军的三个师中,也有两个师的党代表是共产党员;九个团的党代表中,共产党员占了七个;在团长中也有共产党员;至于营以下的各级军官和部队中的共产党员,就更多了。因此,当时我们是有能力给予蒋以恰当而有力的反击的。但是,当时负责处理这个事件的苏联使团团团长布勃诺夫和苏联驻华军事顾问斯捷潘诺夫却认为,事件的发生是因为中共的“错误”引起的,因而采取了一味迎合蒋介石的妥协退让方针,帮助他篡夺了国民党的军权。布、斯等人指责中共“只知利用国民党,在其覆翼之下扩大己党之力量,不知从事于国民党之建设及注意于国民党之左翼,公然攫据国民党之最高管理机关及军队中之政治机关,包办工农运动,以此引起国民党大多数之不满。”<sup>⑥</sup>在他们看来,中共的一切奋斗,只能是为着国民党的,而绝对不能考虑自己的发展,更不要有争夺领导权的非分之想。至于独立自主地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更是不许可的。他们这种指导思想,后来被鲍罗廷概括成一句名言:“中共命中注定要做中国革命的苦力。”

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时,讲了一段非常深刻而又针对性极强的话。他说:对于国民党,“当时大家的根本概念都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象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我认为这是一大错误。”<sup>⑦</sup>应该说,毛泽东的批评,既是针对陈独秀的,更是针对共产国际的。上述共产国际对于国民党二大的方针,就是一个不敢进房去住的典型;而鲍罗廷的“苦力”理论,则是住进去又不敢当主人的奴仆心理的生动体现。

应该着重指出，布、斯等人在处理“三二〇事件”时，完全是背着中共中央一手包办的。开始时，在上海的陈独秀听信了布勃诺夫的介绍，在《向导》周报上写了两篇为蒋介石开脱罪责的文章。但当他了解事件真象后，就改变了态度。陈独秀认为中共中央必须自己制定对蒋介石的政策，因而在4月中旬主持召开了中央会议，决定扩大左派军事力量和工农武装，用以对抗蒋介石，并派彭述之到广州组织特别委员会来贯彻执行<sup>⑦</sup>。但是，当彭述之到达广州的前两天即4月29日，鲍罗廷已经带着斯大林的指示回到了广州，开始进行对蒋介石的新的妥协退让行动了。

《整理党务决议案》是蒋介石为了在国民党领导机关中排斥共产党人，进而篡夺国民党的党权，在5月15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他在会前同鲍罗廷进行了多次协商，并且得到了鲍罗廷的全力支持。蒋介石说：“鲍罗廷自俄回粤，他与我屡次会商国共合作问题，订立整理党务办法，……当鲍罗廷与我会商这个办法时，对我的态度极为缓和。凡我所提主张，都作合理解决……所以我们的会商能达到这八点的协定。”<sup>⑧</sup>因此，可以说这个文件是鲍罗廷背着中共中央同蒋介石一起炮制出来的。与此同时，鲍罗廷还在中共特别委员会上强调：“我们不得不对蒋介石作最大限度的让步，承认他从三月二十日以来所取得的权力，不要反对他的《整理党务案》”<sup>⑨</sup>。因此，“张国焘用了非常不正派的办法要大家签字接受”<sup>⑩</sup>，使其顺利通过。

以上三事，周恩来称之为在政治、军事和党务上对蒋介石的三次“大让步”，<sup>⑪</sup>在这里只是作为例证，用以说明在整个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和苏联代表利用组织原则强迫中共接受其方针、政策甚至公然包办中共事务的实际情况。过去，我们经常讲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造成了大革命的失败，至于共产国际的责任问题，则由于历史的原因，很少涉及。现在看来，陈独秀当然有他的错误，不能否定；中共作为一个郑重的无产阶级政党，在总结经验教训时严于责己，不诿过于人也是正确的。但是从组织纪律方面看，当时的中共领导也确有难言之隐。因为在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也只能唯共产国际代表之命是从。斯大林说过：“我们有足够的权威使中国人接受我们的决定。”<sup>⑫</sup>人所共知，陈独秀等当时中共领导人同共产国际曾经有过多次的意见对立，中共的意见也有正确的，但每次都是以服从共产国际而告终。张国焘就认为：“中共中央不能根据自己所了解的情况，独立自主速决速行，而要听命于远在莫斯科、对中国实际又十分隔阂的共产国际，这是一切困难的主要根源。”<sup>⑬</sup>不合实际的遥控指挥，势必贻误时机，造成严重后果。所以，实事求是地说，对于大革命遭到如此严重的失败，共产国际应该负主要的责任。比较正直的维经斯基自己就承认：“对中国共产党所犯错误我要承担很大的责任，要承担比中国共产党领导更大的责任。”<sup>⑭</sup>

大革命失败了，当事人可以从不同角度总结经验教训。陈独秀在从武汉到上海的船上，嘴里老是自言自语这么一句话：“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sup>⑮</sup>可以认为，这就是陈独秀对于这场大革命基本经验的总结。不管陈独秀一生中有多少错误，应该承认这是一句闪闪发光的话。

## 二

毛泽东指出，大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共产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的革

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sup>16</sup>毛泽东在这里以十分精辟的语言,不但从党的建设的高度论述了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而且指明了中国共产党依靠自己力量胜利地领导中国革命必须具备的前提条件,这就是深入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并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做到二者完整的统一。而这种“统一”,正是毛泽东从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第一天起就开始着力解决的。七大政治报告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sup>17</sup>。平心而论,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作为决策者和指挥者,固然应该负主要的责任,但即使共产国际在一些关键时期能够听从中共同志的正确意见,革命力量的发展可能会快一些,在某些不利的情况下可能减少一些损失,但仍然无法保证革命的必然胜利,因为那时的中共终究还是一个幼年的党。所以,独立自主还是有条件的。中国共产党要想取得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的资格,首要的是自己要有一条适合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这也告诉我们,对于中共和共产国际的关系来说,独立自主不单是一个组织纪律问题,也是一个路线问题。毛泽东说:“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sup>18</sup>其实,在王明之前的1927年11月的“左”倾盲动主义和1930年6月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也都同斯大林有关。因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同各次“左”右倾错误路线进行斗争并且战胜它们的过程,也就是抵制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错误,争取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

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1927年7月28日斯大林发表在苏联《真理报》上的《时事问题简评》中所提出的中国革命“三阶段论”。斯大林把中国的革命分为三个阶段,认为广州时期是第一阶段,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有四个,即农民、城市贫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四一二”后资产阶级叛变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剩下三个;而“七一五”则意味着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脱离了革命,因而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只有农民和城市贫民了<sup>19</sup>。从这个基本估计出发,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就把整个民族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对象,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反对资产阶级才能进行到底,因为资产阶级是阻碍革命胜利的最危险的敌人。由此推而广之,又提出反对农村的资产阶级富农和一切带有资产阶级色彩的中间政治派别。斯大林还给中国革命硬套上俄国的模式,认为大革命失败标志着“中国的二月革命”已经过去,中国革命进入了苏维埃运动阶段,要准备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起义,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了。斯大林的这些主张,成了土地革命时期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基本方针和各次“左”倾错误的理论基础。指出这一点,就可以知道各次“左”倾一次又一次几乎犯了相同的错误的原因所在。

毛泽东摒弃了城市中心的苏联模式,带领起义队伍上了井冈山,把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原理,应用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革命实际,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并且逐步提出和完善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这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路线,它既是马列主义的,又完全适合中国的实际。这条路线的逐步提出,既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又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的开始。

为了引导全党确立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的信念,毛泽东从二十年代末开始,作了一系列的理论上的阐述:

1928年10月,毛泽东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从中国社会的根本特点即地方性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论述了

农村革命根据地得以产生和长期存在的客观必然性。

1930年1月,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批评了所谓“全国性武装起义”的模式,认为“他们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sup>28</sup>这里所批评的,正是斯大林强加给中国的十月革命模式。以后,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对这个思想又作了进一步的展开论述。<sup>29</sup>

1930年5月,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那时就叫“本本主义”,是当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一种危害极为严重的错误倾向。它的产生,既根源于对于马克思主义一知半解的幼稚者的蒙昧,也是共产国际对各国支部“贯彻最严格的国际纪律”<sup>30</sup>的必然结果。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强调了通过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的重要性,批评“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并且大声疾呼:“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sup>31</sup>震聋发聩,字字千金。

1934年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在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错误指挥下遭到了惨败,中央红军不得不进行艰苦卓绝的长征。中国革命处于极端危险的境地。1935年1月,在毛泽东的提议下召开了遵义会议,这是中共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集中批判了李德在指挥战争中一人包办的极端恶劣作风及其一系列脱离中国实际的错误战略战术,诸如“单纯防御”、“全线出击”、“赤色堡垒”、“短促突击”,以及突围之后的逃跑主义<sup>32</sup>。遵义会议决定撤消李德的军权,会后又成立了有毛泽东参加的三人军事小组,从而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就不但标志着中共中央重新争得了对于中国革命战争独立自主的领导权,而且标志着中共中央开始走上了独立自主的道路。

1935年12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集中批评了“左”倾关门主义的种种错误言论:“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全部永世反革命了。对于富农,是一步也退让不得。对于黄色工会,只有同它拼命。如果同蔡廷锴握手的话,那必须在握手的瞬间骂他一句反革命。哪有猫儿不吃油,哪有军阀不是反革命?知识分子只有三天的革命性,招收他们是危险的”,如此等等。这些观点虽然是犯“左”倾错误的人提出的,但了解情况的同志都知道,这些正是共产国际的主张。而在这些主张的背后,就是上述斯大林的那个中国革命“三阶段论”。毛泽东还在这篇报告中论述了国际援助的问题,第一次提出了“自力更生”的口号,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sup>33</sup>毛泽东实际上是在这里宣布:驱逐日本侵略者、收复失地要我们靠自己,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更要靠我们自己。

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系统地总结了十年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指出:“中国革命战争的许多方面都有其自己的不同于苏联内战的特点”,批评了所谓“完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错误的战略战术原则,诸如“全线出击”、“夺取中心城市”、“两个拳头打人”、“御敌于国门之外”、“六路分兵”、“堡垒战”、“消耗战”等<sup>34</sup>。人所共知,这些全都是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批判过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主张。正因为如此,陈云曾经指出:在遵义会议上,“毛主席讲得很有道理,内容就是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sup>35</sup>而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不但从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的结合上进一步清算了李德错误的根源,而且提出了

一整套中国革命战争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因而同此后不久所写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一起,标志着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成熟。

收入《毛泽东选集》的六届六中全会的三篇文章,都是批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而正如毛泽东指出的,王明的一系列右倾主张,又都是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那里来的,诸如认为蒋介石是抗战的领导者,幻想依靠国民党军队求得速胜,鼓吹“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其实质是信任国民党超过信任共产党,因而不敢独立自主地领导这场民族解放战争。毛泽东在这些文章中,彻底清算了这种软弱无能的腐朽的违背马列主义原则的思想。六中全会还从组织上肯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并且在纪律上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从而保证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能够完全根据实际情况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方针政策和处理内部事务,这就标志着中共中央最终摆脱了共产国际的干扰,彻底地走上了独立自主的道路。所以,毛泽东曾经深刻地指出:“中国党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一次是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三八年的六中全会。……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sup>28</sup>当然,遵义会议以后,在从组织上确立毛泽东在中共全党的领导地位的过程中,共产国际面对中共党内的既成事实,曾经给予积极的支持,这一点也是应该肯定的。

1943年5月,当毛泽东听到共产国际宣告解散的消息时,高兴地说:“他们做得对,我就主张不要这个机构。”<sup>29</sup>大家知道,毛泽东对共产国际的评价是“两头好,中间差。”<sup>30</sup>但就在这总起来说还比较好的后半头,毛泽东还是认为它是不必要的。这也可以看作是毛泽东对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所犯错误所表达的强烈不满。其后,前共产国际的一些领导人虽然仍想干预中共的事务,其较著者如1943年12月季米特洛夫那封无理指责我党整风运动的信件<sup>31</sup>,但这些错误的东西,早已对我们党不起什么作用了。

### 三

应该指出,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之所以不愿意中共独立自主,甚至干涉我们的内部事务,除了上面所讲的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的经验神圣化,不考虑我国的特点,自以为是地强加于人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苏共大搞以我为中心的大党主义,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错误地轻视了中国共产党。

苏俄(后来发展成为苏联)在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内,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共产国际的所在地。共产国际“二大”通过的《共产国际章程》第八条规定:“执行委员会的主要工作,由世界代表大会决定作为执行委员会所在地的该国共产党承担。”<sup>32</sup>苏共既然“承担”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主要工作”,也就在实际上成了共产国际的领导中心。正因为如此,威廉·福斯特指出:“俄国党是共产国际的领导政党。”<sup>33</sup>苏共在国际共运中这种特殊地位,为他们大搞以我为中心的大党主义开了方便之门。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为把中国变成日本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严重步骤。中华民族进入了危急关头。但是,苏共从自我中心出发,授意共产国际接连发出两次“呼吁书”,说什么这是日本“向反苏战争又前进了一步”,“是进攻苏联的序幕”<sup>34</sup>,并指示中共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毛泽东后来在延安马列学院讲到这个问题时尖锐地指出:“日本人占了我们东三省,我们却贴标语要‘武装保卫苏联’,这不是发神经病吗?”这个“神经病”正是共产国际

要我们“发”的。历史证明，这个口号是极其错误的，因为它严重地脱离了中国的广大群众。因此，加上其它的错误，就导致了“九一八”以后所出现的抗日救国有利形势的丧失。

苏德战争爆发后，斯大林为了减轻日本对其东线的威胁，几次打电报给毛泽东，不顾我们当时面临的严重困难，要求我们出兵到长城一线甚至外蒙边境地区牵制日本。这种不合实际的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毛泽东的拒绝。对此，他们是很不满意的。1973年出版的共产国际驻延安的联络员和苏军情报员符拉基米诺夫（孙平）的《中国特区》（又名《延安日记》）一书中为此说了我们很多坏话，说我们抛弃了国际主义。毛泽东早就说过：“中国是被侵略的国家。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中国胜利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被打倒了，同时也就是帮助了外国的人民。因此，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sup>⑧</sup>这就告诉我们，在当时中华民族处于危亡的时期，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决定战略方针，夺取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就是实施了国际主义。毛泽东对于国际主义的精辟论述，同样闪耀着独立自主思想的光辉。各个无产阶级政党，首先应该把自己国家的事做好，然后才能谈得上国际主义。如果不顾自己的实际情况，一味听从别人的指挥，那就不但不能引导本国的革命取得胜利，也无法尽到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王明的错误就是一例。毛泽东曾经深刻地指出：“王明问题的关键、症结之所在，就是他对自己的事（指中国革命问题）考虑得太少了，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得太多了。”<sup>⑨</sup>有的同志认为，《中国特区》一书是七十年代初期苏联领导人为了反华的需要，由孙平的儿子根据有关档案资料编撰出来的，并不能代表孙平本人的看法。笔者则认为，孙平当时虽然在表面上同我们的关系还好，但他终究是代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尽管该书在整理时很可能捕风捉影、添油加醋，但书中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记载应该说是反映了孙平的基本看法的。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何以会有上述季米特洛夫的那封信。

苏联的大党主义和利己主义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如苏联1945年与美国签订的划分战后势力范围并严重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雅尔达协定》，以及为实施这个协定同国民党政府所进行的谈判，都是背着我们党干的。此外，毛泽东在讲斯大林的错误时还说：“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打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九五〇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sup>⑩</sup>这就表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我们党有一种强烈的不信任情绪。这种不信任情绪，从我们建党开始就有了。

在中国，共产国际从一开始就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协助中共进行一大筹备工作并列席一大的马林，在1922年7月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就极力拔高国民党，贬低共产党，甚至说虽然中共成立并加入了共产国际，但“它仍然作为一个宣传团体会更好一些。”<sup>⑪</sup>此后，共产国际鼓吹国民党的言论长篇累牍，比比皆是。甚至到了“七一五”以后，还不准中共退出国民党。

1927年6月，布哈林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体会议向联共莫斯科市委全会作情况介绍报告时，将联共中共进行了对比。他说：“我们的党在建立时就是一个由吸收了西欧社会主义运动全部马克思主义经验的知识分子和工人组成的团体；俄国社会主义的奠基人都是学识渊博的马列主义者。我们一开始就奠定了工人政党的马克思主义基础。但是我们的中国共产党则是在另一种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它是从孙中山的民粹主义脱胎而来的，不熟悉马克思主义原理。”<sup>⑫</sup>布哈林在这里简直是信口开河。人所共知，中共的主要发起人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在十月革命后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们并不是孙中山的信徒。相反地他们中有一些甚至对国民党是持批评态度的，陈独秀在1922年4月写给吴廷康（维经斯基）的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信，就是一个证据。

至于说中共“不熟悉马克思主义原理”，则是一种偏见。究其根源，一是把马列主义当成教条，认为背得多才叫“熟悉”；二是不懂得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样一个根本原则，因而对于毛泽东、瞿秋白等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根据这个原则已经作出的理论创造视而不见。

最能集中地表达斯大林对我们的不信任情绪的，是说我们党是“人造奶油”。这个话他不但在外交场合讲过，也在私下讲过<sup>⑧</sup>，应该说是反映了斯大林的真实看法的。毛泽东不是讲过在我们建国之后斯大林还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吗？总之，在斯大林看来，中共只是一个“土地改革者”或“民族主义者”的政党，够不上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斯大林的这种看法，无疑地影响了共产国际。周恩来说：“一九四〇年我到共产国际去，共产国际的领导同志都还担心我们离无产阶级太远了。我说我们在农村里经过长期斗争的锻炼，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完全可以无产阶级化。共产国际的一些同志听了之后大哗，不以为然。”<sup>⑨</sup>中共一开始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政党。但共产国际在中共成立19年之后，一听到中共可以无产阶级化竟然还要“大哗”，由此可见他们这些人对中共是个什么态度了。所以，1945年刘少奇在七大政治报告中，用了很大篇幅专门阐述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性质的问题，并且郑重宣布：中国共产党“与任何资本主义国度内的无产阶级政党比较，至少是毫无愧色的。”<sup>⑩</sup>笔者认为，刘少奇这些话有很强的针对性，他针对的就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错误看法。

1949年1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在他同斯大林见面时，第一句话就是“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sup>⑪</sup>。应该说，这句话中包含了对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批评。因为大家知道，排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正是受他们支持的王明等人。其后，在中共八大时，毛泽东又和参加会议的苏共代表米高扬谈话，全面深入地批评了苏共的“老子党”错误。毛泽东说：中国党在革命发展的各个阶段中的“左”右倾错误，“都是由于不相信自己，而一味盲听盲从的结果。也是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貌似老子党与儿子党之分的不正常的党与党之间关系的结果。……试想，怎么可以根据一个党的具体条件、具体需要、具体利益出发而制定出来的方针、政策，就是绝对正确的，而去要求处在另一种情况、环境条件下的党去听从，或照搬、硬套呢？怎么可以以一个党的利益替代另一个党的利益呢？”毛泽东还指出：“‘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最严重、最根本的错误是打击、排挤正确领导，否定、抛弃从实际出发制定出来的正确路线”。这些话可和上述毛泽东对斯大林讲的那句话互相参照。共产国际和王明打击、排挤的不单是毛泽东本人，而是中共的正确路线和正确领导，从而给中国革命带来了灾难。因此，毛泽东愤慨地说：“对当年共产国际和苏共的作法我们是有一些意见的，过去我们不便讲，现在要开始讲了，甚至要骂人了。我们的嘴巴，你们是封不住的。”<sup>⑫</sup>毛泽东的这一番谈话，不但批评了共产国际和苏联的错误，而且是对国际共运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总结了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指出：“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sup>⑬</sup>当前，我们党正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胜利前进，“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这原因不是别的，正是因为这条基本路线是我们党独立自主地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的并且受到全国各族人民热烈拥护的唯一正确的路线。



